

釣魚島事件與中國民族主義



2012年的中國大事記，釣魚島事件一定是名列前茅的。釣魚島事件反映了中國內政外交的困境，但其政治意涵遠不止於外交領域。這一事件一來透露出未來中國改革路向和解決問題的方式，二來呈現出中國崛起之際對國際事務應具備的理性籌劃思路。將兩者合起來看，釣魚島事件促進中國政治生活走向現代的兩種可能性便凸顯出來：一是理性規訓中國粗糙的民族主義，使其成熟而精緻；二是促使中國走上憲政民主的政治軌道，為規訓民族主義提供政治制度平台。

2012年的中國大事記，釣魚島事件一定是名列前茅的。釣魚島事件反映了中國內政外交的困境，但其政治意涵遠不止於外交領域。事件一來透露出未來中國改革路向和解決問題的方式，二來呈現出中國崛起之際對國際事務應具備的理性籌劃思路。

一 釣魚島事件與陡漲的民族主義

從其本身來看，釣魚島事件是一個既可以放大也可以縮小來看的事件。所謂「放大來看」，一是歷史的放大，使之成為一個涉及中日兩國近代以來領土糾紛的事件，而不是一個當下突兀出現的主權爭執個案；二是政治的放大，使之成為一個體現中日兩國國力變化的事件。兩國綜合國力強弱的轉變，構成事件背後蘊含的國家間競爭根柢。

所謂「縮小來看」，一是歷史的縮小，即釣魚島事件是1970年代以來發現該島附近蘊藏石油資源之後，中日兩國奪島情緒驟然升溫的結果，尤其是兩國後來均醒悟到這個小島具有地緣戰略價值，奪島之爭就更是火上澆油了。就此來看，釣魚島之爭的正式時間跨度其實並不太長。二是政治的縮小，釣魚島事件在政治上不是中日兩國的頭等重要大事，只是兩國處理國內政治事務的籌碼，兩國並不需要當即解決小島歸屬。就此來看，釣魚島事件不過是兩國以外交面目修飾起來的國內政治事務。

但正因為「可大可小」，處理釣魚島事件反而增加了這一事件演進的戲劇性。在現代國家間的領土爭端歷史上，撇除真正訴諸戰爭手段以解決領土歸屬之事件外，絕大部分在和平環境下被激發的領土爭端事件，其實都是當時的國

內政治事務處置不當所引出的外交事件。在2012年的釣魚島事件中，這一特質得到了鮮明體現。在這個特殊的年頭，中日兩國政府都需要將這個小島「事件化」，以便騰出手來處理國內棘手的社會政治事務。

事實上，兩岸三地一直存在着保釣運動。其實，作為社會運動，保釣運動與國家權力關係不大。但保釣常常激發國家權力作出反應，結果社會運動便演變成外交事件。2012年的釣魚島事件，就正是這兩種因素促成的結果。是年1月，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從香港出發前往釣魚島，但被香港水警攔下。7月，台灣中華保釣協會部分成員乘船進入釣魚島水域，並展示五星紅旗。8月，十餘名香港民間保釣人士乘船到達釣魚島，衝破日方重重包圍，跳海游上釣魚島，成功在島上插上五星紅旗。中國民間保釣行動激發了中國人的愛國熱情，促使釣魚島問題走向中國政治的前台，官方無法迴避。而日本官方與民間的強烈反應，一方面激化了中國民間的保釣激情，另一方面也使中國政府不得不高調表態，誓言捍衛領土完整，並不斷派遣漁政船、巡航機前往釣魚島水域巡邏，提交相關海事文件給聯合國，制訂相應的軍事應變方案，最後更使出海空立體巡航的手段向日方施加高壓。

但毋庸諱言的是，中國政府並不希望釣魚島事件朝向不可控的方向發展。原因很簡單。2012年是中國內外挑戰齊至的一年。對內，黨政領導人換屆出現了複雜局面，權力的內部紛爭難以平息；同時，中國社會的不安情緒愈來愈明顯，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任何社會政治事件的處理稍有不慎，就可能釀成難以收拾的局面。對外，中國擺出的大國姿態，激發了一系列國際反應。中國周邊國家的警覺無需多說，美國強勢重返亞洲也是中國政府不願見到的國際政治局面。不過，讓中國政府為難的是，數年來營造的大國崛起氛圍，讓國人覺得可以輕而易舉收回近代以來失去的領土，因此面對釣魚島事件，政府的調門低不下來。政府不得已的高調，更是促使釣魚島事件衍生出社會運動，讓政府不得不使出主動創穩的方式，來緩解可能引起政治動蕩的社會緊張。

對日本而言，2012年的政經局勢，讓釣魚島成為日本政壇一個重要和可以充分利用的因素。對內，自1990年以來就陷入停滯的日本經濟，近期並無改善。經濟長期不景，促使政治成為主導日本社會的因素。在中央一級，政府更迭幾乎不到一年就來一次。因此，如何掌握政治主動權，成為政治精英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當新生政治勢力對中央政府提出頗具挑戰性的主張後，中央政府必須拿出更為強硬的舉措，否則就不足以回擊挑戰。2012年4月，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訪美時提出東京都政府購島主張，日本政府官房長官藤村修隨即表示，中央政府在必要時會出手購島。9月，日本政府宣布購買釣魚島，對其實施國有化，似乎只有這樣才能反擊東京都地方政府取得的政治優勢。對外，日本一向對中國採取虛與委蛇的政治姿態，務求取得國內政治力量的支持。時任日本首相的野田佳彥表示，中央政府購島就是為了防止石原慎太郎藉釣魚島生事。然一旦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中國方面的領土主張必將受到更大挑戰。與此同時，日本政客之間就釣魚島展開的競爭與合作，促使日本社會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右翼政治實力大增，民間的右傾情緒明顯高昂。

事實上，兩岸三地一直存在着保釣運動。其實，作為社會運動，保釣運動與國家權力關係不大。但保釣常常激發國家權力作出反應，結果社會運動便演變成外交事件。2012年的釣魚島事件，就正是這兩種因素促成的結果。

需要強調的是，2012年釣魚島事件，與1970年代、1990年代、新千年前十年的三次保釣浪潮明顯不同。這次釣魚島事件是在中日兩國國內和國際政治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浮現的。儘管中國內外處境存在困難，但是大國崛起的話語動力和實力改變，促使中國擺出了比以往更為強硬的外交姿態；民間對國家實力強硬一面的認知，更催化了反日保釣的民族主義情緒。官民雙方相互促成了一場由民族主義引導的保釣運動。而日本相對於中國崛起的發展遲緩，也讓日本的民族主義認知強化，使日本政府急欲引入美國因素，對中國進行反制，結果更助長了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升溫。中日兩國在釣魚島事件上展現了對撼的民族主義張力。不過，相對於還算理性的日本民間民族主義情緒，中國民間被激發出來的民族主義情緒，陡漲到以暴力才得以釋放的地步。

儘管中國內外處境存在困難，但是大國崛起的話語動力和實力改變，促使中國擺出了比以往更為強硬的外交姿態；民間對國家實力強硬一面的認知，更催化了反日保釣的民族主義情緒。官民雙方相互促成了一場由民族主義引導的保釣運動。

2012年釣魚島事件，成為辨識中國民族主義當代走勢的一個標誌性事件。9月15日，國內部分大中城市的保釣遊行示威，讓人們見識了陡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促成的暴力事件的可怖。保釣遊行示威中釀成的暴力事件，當然具有保護領土完整的理性訴求，但更具有非理性的不滿時局、怨恨不公與仇視權力等種種情愫。這促使人們思考，中國在內政外交上如何才能走上一個理性的發展軌道，既發揮民族主義的積極作用，又成功控制民族主義的消極負面影響。

二 有欠成熟的政治民族

9月15日，中國國內部分大中城市的保釣遊行示威，是近年規模最大、涉及面最廣、影響最巨、促使國家重建最力的一次公眾事件。而9月10日日本中央政府的購島行動，正是促成中國國內大中城市保釣遊行示威的直接原因。中國民眾長期以來缺乏釋放政治緊張的途徑，因此藉釣魚島事件以發洩緊張情緒，則是促成示威遊行的間接動力。但在示威遊行將保釣運動推向人人矚目的高潮之際，促人沉潛反省的問題則是，中國如何可以成為一個理性表達政治訴求的民族，有效地自我控制民族的政治情緒，理性籌劃國內事務和處理國際糾紛，進而邁入現代國家的行列。

9月15日先後出現在西安、長沙、青島、廣州、深圳、上海等地的保釣示威遊行，顯示了中國的民間力量，也顯示了官方與民間互動的錯位，更顯示了中國社會行動的非理性特質。在不同城市的遊行示威活動中，保釣是直接主題，表達訴求則是潛藏的動機。整個保釣遊行示威中值得人們高度關注之處，顯現為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有欠成熟的政治訴求表達方式。在保釣遊行示威中，人們打出了捍衛國土安全的種種標語，關乎中國保衛領土完整和國家利益，諸如「給我槍給我炮，我來保衛釣魚島」，「誓死捍衛中國領土釣魚島」，「日本滾出釣魚島，保衛國土」，「釣魚島是中國的，只有蒼井空才是世界的」。這些口號表現了中國公民的國家歸屬意識，顯示了公民的政治責任。但其中包含的軟性暴力、政治

搞笑、情緒發洩，已經提醒人們，中國人表達政治訴求的方式，存在結構性改進餘地。

第二，赤裸裸的暴力傾向。在保釣遊行示威中，有人打出了象徵着毀滅性暴力的標語，比如「哪怕華夏遍地墳，也要殺光日本人」，「寧可大陸不長草，也要收復釣魚島」。似乎只要收復釣魚島，中國犧牲再多的性命也在所不惜。中國人寧願以嚴重的自我傷害來換取釣魚島的失地復得。在政治衝突中，理性的得失計算似乎完全變得不必要了；一種完全非理性的魚死網破理念徹底控制了人們的保釣情緒。另外，有人在中國人民大學外的一家小餐館張貼的標語「日本人與狗不得入內」，就更是毫不掩飾地表現了張貼者與曾經侵犯中國的侵略者一樣的、對利益衝突國普通公民的政治敵視心理。

第三，不滿現實的社會心理和政治取向。保釣遊行示威人士也打出了讓國家權力當局憂心如焚的標語口號，如政治針對性極強的「釣魚島是中國的，薄熙來是人民的」，「毛主席，想念你」，「要怎麼收回國家領土——釣魚島？不如叫城管和中國的貪官去吧」。這三個口號體現出當代中國社會三種政治取向：(1) 對操縱民粹主義、文革式動員方式的「重慶模式」，以及薄熙來的強烈期待；(2) 對毛澤東那種不考慮國家實力，虛張聲勢地高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紙上政治鬥爭模式的情緒性眷念；(3) 對中國無法有效規範權力，貪官污吏橫行，內政不彰，外交被動，因此無法騰出手來施展外交手段的深切不滿。這是保釣示威遊行促使人們恣意發洩情緒，進行暴力破壞的現實刺激因素。

基於上述三點，人們似乎在這場保釣示威遊行中發現了義和團的幽靈。據報導，9月的遊行示威，僅深圳一地，就出現了若干失控迹象，不僅有地區出現日本品牌警車被砸毀，中共深圳市委大院16日中午也遭到衝擊，大院鐵柵欄被推倒，還有示威者爬上深圳的標誌性雕塑「孺子牛」踩踏。下午近3時，特警釋放催淚彈，強行驅散示威者，造成相關人員受傷。這些暴力行動，除了發洩人們的不滿以外，對釣魚島能否收回沒有任何幫助。而在魚死網破心理主導下的制裁日本籲求，就更是寧願自己蒙受慘重損失，也要傷及日本筋骨，但卻對傷人三分、害己七分的結果在所不計。人們在網上呼籲全面抵制日貨，網絡上出現了抵制日貨的各種清單，還計算了購買日貨對中國的不利影響，例如「每直接或間接地購買100人民幣日本貨，你就：1、為日本廠家增加40元的毛利收入。2、為日本企業增加了20元的擴張資本。3、為日本政府增加了5元的稅收收入。4、給日本增加了10顆子彈。5、多印6-8頁的篡改歷史的教科書和文件」。這樣的計算迅速在網上瘋傳，但對中國如此制裁日本反使自己遭受多麼重大的損失，則三緘其口，不聞不問。

種種迹象表明，保釣運動呈現出來的中國人政治行動模式，確實是不成熟的政治民族才會表現出來的行動方式。一個成熟的政治民族，必須對關乎民族政治利益的兩件大事了然於心：一是本民族如何有效處理好自己的政治事務，促使國家權力皈依伏法、保護公民利益，進而敦促公民理性思考和合法行動，讓社會安寧有序；二是在與其他民族—國家打交道的時候，如何平衡處理國家間的利益關係，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維持理性而友善的外交關係。前者關

在保釣遊行示威中，有人打出了象徵着毀滅性暴力的標語，比如「哪怕華夏遍地墳，也要殺光日本人」。似乎只要收復釣魚島，中國犧牲再多的性命也在所不惜。中國人寧願以嚴重的自我傷害來換取釣魚島的失地復得。

乎國內政治秩序的建設問題，後者關乎國際政治秩序的構造問題。在全球化時代，處理好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兩者之間的關係，更具有相互牽扯、互相影響的效用。一個成熟的政治民族，絕對不會無視國內政治局勢，一味出擊，在國際社會四面樹敵；也不會在國際社會韜光養晦，在國內政治施加全面強制力量，讓社會處在一個憤怒無處發洩的緊張狀態。一個成熟的政治民族，其國內政治足以讓公民安心、舒心、放心，從而為國際事務的處置奠定堅實的國內政治根柢；國際政治善於兼施硬實力、軟實力與巧實力，從而為國內政局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顯然，從保釣示威遊行來看，中國還沒有成為一個成熟的政治民族。國內政治困境讓公民鬱悶且無處發洩，人們不得不藉機爆發，從而造成破壞性結果。國際政治的長期低調、缺乏捍衛主權與國家尊嚴的應對能力，讓國民心裏難以為國家感到自豪。這就造成國家處理國內事務和外交事件的雙重緊張：一是必定顧此失彼，無法兼顧內政與外交，甚至使內政與外交相互衝突；二是必定失於理性而系統的謀劃，僅僅只顧眼前政治局勢的需要，不管中長期國家利益的寄託，內政外交都只是着眼於短視眼光的短期行為。這就更為加劇了公眾愛護國家、表達民族情感的非理性性質，造成公民國家情感的幼稚化。這種非理性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行動都是逞一時之快的情緒發洩，而不是對國家利益的周全考量和理性計算、對國家深沉而執著的理智愛護。

從保釣示威遊行來看，中國還沒有成為一個成熟的政治民族。國內政治困境讓公民鬱悶且無處發洩，人們不得不藉機爆發，從而造成破壞性結果。國際政治的長期低調、缺乏捍衛主權與國家尊嚴的應對能力，讓國民心裏難以為國家感到自豪。

三 暴力、愛國與馴服民族主義

一個有欠成熟的政治民族，在對己對人方面，必定會陷入手段短缺、價值偏失的困境。本來，政治不成熟是完全不能與中華民族聯繫在一起的，因為中國人實在經歷了漫長而艱鉅的政治生活歷程。但為甚麼具有悠久政治傳統的中華民族反而成為政治上不成熟的民族呢？這是一個需要放寬歷史視野才足以弄清楚的問題。

在古代歷史上，中國人建構了天下觀支撐的「國際」理念。天下觀是一種德性主義支持的政治觀念。它拒絕從強權合法擁有者的視角看待國家，主張從道德感化的角度定位人類龐大的政治組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德性一以貫之、串聯個人到天下的遞進性政治理想，德性原則成為約束政治權力的決定性力量。中國古代歷史中的暴力征服，就此被德性力量所馴服、壓制和引領。這些暴力征服，基本上是進入中原的少數民族施加給漢民族的。但只要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從流寇演變為坐寇，一般也會採用儒家的德性主義方式來統治國家。這給中國主流的非暴力主張注入了強心劑。

但自近代以來，中國人體會了完全不同的國家間行為邏輯。由於中國採取閉關鎖國政策，完全脫離世界現代化變遷，自外於全球化進程，因此迅速由先進國家墮化成落後國家，成為發達的西方國家刀俎下的魚肉。西方列強以武力打開了中華帝國的大門，強迫中國走上了現代轉軌的道路。中國傳統的王道政

治理想，就此轉換為霸道政治追求。早期中國現代化尋求堅船利炮強化國力的嘗試，便是武力救國的濫觴。西方國家對中國施加武力，中國希望用勝於西方的武力加以反制，內外合力，造成中國人對武力的尊崇。加上中國自古至今在統治方式上一直實行理所當然的、不容置疑的族姓統治——這種統治邏輯顯在的暴力性質，與近代以來國家崇尚武力以至暴力的民族心態相扣合，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說的民族—國家與暴力的關係，格外刺眼地作用於中國的民族國家建構進程。

近代以來中國人建構自己的民族國家，愛國主義提供了最為強大的精神動力。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是一個混生的精神體系。它既用來確認中華民族的邊界，也用來辨認民族—國家之間的界限，尤其是用來劃分中華民族之作為被壓迫的悲情民族與西方之作為壓迫中華民族的侵略者之間的嚴格界限。對外的以暴易暴心理，深深潛藏在中國人抵抗西方國家侵略的心底；同時，對內的以暴易暴心態，也生成於國內統治者濫施暴力的傳統中。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世界中鏤入的暴力因素，在中華民族悲情崛起的漫長歷程中，逐漸被歷史所固化，成為中國的現代精神基因。

推動中國現代轉型最為有力的中國革命，從晚清到人民共和國，走的都是一條暴力革命的道路。晚清改良失敗，由革命之手鍛造出了一個民國。民國的「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主義」的統治邏輯，形成了國家粗暴的統治定勢。一切試圖理性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嘗試，都被國家當局所排斥。缺乏理性精神、權力分享和政治妥協的民國，無法有效吸納精英參加國家治理。因此，懷抱崇高理想的人士組成不同的革命政黨，掌握強有力的革命軍隊，終於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建立起人民共和國。但人民共和國還是走上了一條贏家通吃的治國道路。整個中華民族在這樣的政治演變中，受到了暴力化、排斥性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教育。因此，當國人認定自己是正當地表達民族情緒、愛國熱情時，那就會完全不容商議、絕對正確無疑地行使暴力「權利」。

中國現代政治史促成的民族主義，原本沒有那麼暴力。早期中國的民族主義，在理論形態上自覺建構的民族理念，是文化民族主義。這是一種僅僅基於文化的民族自豪感確立起來的民族主義觀念。建立在文化、傳統、習俗基礎上的文化民族主義，對於別的民族並沒有一種訴諸暴力的排斥性。但在內政外交上體會國家暴力邏輯的中華民族，逐漸陷入種族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浪漫民族主義的泥淖而難以自拔。

種族民族主義以種族間的絕對差異立論，將自然生成的族群作為政治民族的區分標準。晚清革命黨人主張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就表現出了種族民族主義的特點，後來才為孫中山「五族共和」的政治民族理念所取代。但種族民族主義的排斥性民族觀念，卻深植人們的大腦。1949年以來中國出現整全性的國家民族主義理念——一切事宜都只能在國家範圍內考量才具備合理性，結果讓民族主義完全窒息了個人自由；集體行動成為民族成員趨同行動的唯一方式。1960年代，中國最高領導人宣稱全面挑戰帝、修、反，促成了浪漫民族主義的興起。浪漫民族主義興起之後，將中華民族虛構為獨具優越性的民族，以各種

中國現代政治史促成的民族主義，原本沒有那麼暴力。早期中國的民族主義，在理論形態上自覺建構的民族理念，是文化民族主義。但在內政外交上體會國家暴力邏輯的中華民族，逐漸陷入種族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浪漫民族主義的泥淖而難以自拔。

傳奇建構民族神話，而那些自認繼承了中華民族獨有優秀品質的統治集團，也就自認是民族的代表者與代言人。

諸如此類的民族主義，在動員民族凝聚力以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也發揮過積極作用，但長遠的結果卻是消極的：它們讓公民缺乏辨認個人與國家關係的興趣，使公民對國家間關係的認知非常粗疏，在國家間關係上缺乏國際法觀念。一旦情緒性的民族理念和愛國衝動開始發作，公民就會訴諸根深蒂固的暴力性愛國情緒和粗糙的民族意識，進而產生可怖的暴力行為。

對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與維護來說，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就其動員民族認同、推動國家建構而言，民族主義不分形態差異，都能發揮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在民族國家建構的過程中，它也常常發揮排斥性、暴力性、對峙性的作用，因此造成民族間的對立情緒，讓一個民族陷入非理性的迷狂狀態，無法在民族間擇善而從，高度理性地謀劃民族國家的發展事務。因此，現代民族國家無一不艱難地嘗試馴服民族主義。馴服民族主義，在精神上最好的辦法，就是用健全的民族主義理念代替非理性的民族主義衝動。其中，對馴服民族主義衝動最為有益的就是公民民族主義、自由民族主義和憲政民族主義。

公民民族主義足以針對種族民族主義的缺陷，將不同民族長期共同生活的經歷契約化，並因契約授予國家合法性，從而大大降低了種族民族主義的內生狂熱性。自由民族主義足以對治國家民族主義，將個人自由作為消除國家至上毒素的民族聚合基因。憲政民族主義可以消解文化民族主義的價值自足性，促成民族成員的寬容性心態、包容性心理，進而讓多民族國家的國家認同變得更加具有彈性與韌性。

釣魚島事件表明，中華民族之作為一個政治上有欠成熟的民族，種族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與浪漫民族主義理念有餘，但公民民族主義、自由民族主義與憲政民族主義資源不足。因此，一旦民族成員認定民族的集體利益受到侵害，便會理所當然地訴諸暴力行動，來發洩自己的憤懣。如果那些訴諸暴力的保釣示威遊行人士心中深懷被馴服了的民族主義理念，他們的行動就會理性、清醒得多，也就不會單純受民族—愛國理念的驅使，並會理性計算民族—愛國行動的收益或效果。

四 以憲政愛國主義馴化政治衝動

民族主義不僅是一種精神理念，更是一種政治行動方式。如果說馴服民族主義的精神手段是用良性民族主義替代惡性民族主義，那麼，在政治制度上，就必須用化解民族主義惡性發作的憲政制度，來馴化一個民族的政治衝動，保證民族成員在形形色色的政治衝突面前，不至陷入難以駕馭的政治衝動之中。

誠如前述，民族主義或會呈現出促使人衝動的形態。諸如種族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和浪漫民族主義，都是必須經過精神馴服、更必須經過政治馴化的民族主義理念。不是說公民民族主義、自由民族主義、憲政民族主義就不需要政治馴化，但這類民族主義理念，本身就是馴化政治衝動之後積澱下來的政

現代民族國家無一不艱難地嘗試馴服民族主義。馴服民族主義，在精神上最好的辦法，就是用健全的民族主義理念代替非理性的民族主義衝動。其中，對馴服民族主義衝動最為有益的就是公民民族主義、自由民族主義和憲政民族主義。

治理念。這些政治理念，在各種動態發展的政治情景中，又不斷提供新的馴化動力，補充民族主義的良性政治動能。

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是混生的。一切民族主義的精神訴求，歸根結底就是對自己民族的建國事業發揮積極推動效能。雖然在民族的發展史上，有所謂「建立了國家的民族」與「沒有國家的民族」之分，但是，政治上達到理論自覺的民族主義，都直接指向民族—國家的國家建構目標。基於此，民族主義就更是與愛國主義緊密勾連，難分彼此。

然而，在歷史上，愛國主義並不一定與民族主義勾連在一起。尤其是對歐洲的城市國家來講，所謂「熱愛自己的城市，勝於熱愛自己的生命」，指的僅僅是城市公民對生活其間的城市發自內心的愛護情感。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混生形態，與近代出現的民族國家聯繫在一起。當一個建立在語言、文化、傳統、習俗、土地等「自然」因素基礎上的民族，嘗試建立起自己的政治體的時候，「民族」就不再成為一個傳統概念，而成為一個政治概念了。反過來，國家權力體系又自覺利用民族主義來正當化國家統治與資源吸納。這個時候，愛國主義就與民族主義緊密扣合起來，難分軒輊。

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做一個粗略的異同分析，可以知道，兩者都是將政治觀念與政治行動攪合在一起的現代意識形態。如果做一個相對的劃分，民族主義是以自覺理論形態、精神觀念，為愛國主義的行動選擇提供觀念支持。尤其是當愛國主義作為維護政治民族意義上的多民族國家體系的觀念時，它的民族主義觀念支撐，更形明顯。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民族國家既需要馴服民族主義，也就需要馴化愛國主義。愛國主義可以體現為一種文化情懷。但從政治上看，愛國主義的文化情懷，是一種國家認同的轉變形式。因此，愛國主義明顯地是一種政治意識、政治偏好與行動指南。熱愛自己的國家，就意味着排斥別的國家；熱愛自己國家的程度愈深，排斥別的國家的程度就愈強。愛國主義的排斥性，使得它呈現出一種直覺性、盲目性和敵對性。加之歷史上的愛國主義，主要由共和主義提供精神動力。一種集群生活的政治習性塑就的愛國主義熱情，常常是文化—政治自戀的產物，而不是理性計算和得失衡量的結果。愛國主義之作為日常情感，常常不易為人們覺察，是潛移默化的天然產品；愛國主義之作為政治行動，則來得如暴風驟雨，是政治煽動的人工製品。

在釣魚島事件中，中國人基於愛國主義的政治暴戾行為，初始動力是愛國的日常情懷，後發動力則是政治動員的煽情。愛國主義的政治行動，一定是透過從眾行為才能體現其精神實質的。要想馴化愛國主義，就必須馴化那種經受不住政治煽情的古典共和主義愛國傳統。就此而言，必須告別高舉共同生活傳統的古典共和主義的愛國主義精神。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不能成為愛國主義的現代精神化身，因為他主張的愛國主義太過注重集體生活的一致性、淳樸性和排斥性。一旦將愛國主義放置在集體主義的平台上，它就無法促使人們採取理性的政治行動，就一定會煽動人們投入熱情似火的集體行動，從而在集體行動中獲得身份的一致性認同、得到集體行動的愛國暢快感、發洩集體蓄積的不滿情緒。由此，一切都以集體的名義進行，無論集體是在進行建設，還是在造成破壞。

在釣魚島事件中，中國人基於愛國主義的政治暴戾行為，初始動力是愛國的日常情懷，後發動力則是政治動員的煽情。愛國主義的政治行動，一定是透過從眾行為才能體現其精神實質的。要想馴化愛國主義，就必須馴化經受不住政治煽情的古典共和主義愛國傳統。

自由民族主義曾經是馴化國家主義、共和主義的愛國主義衝動的最好解毒劑。但是，自由民族主義單純基於個體自由對民族的認同、對國家的忠誠，常常無法有力地響應個體的集體生活需求，無法強有力應答群體生活的集體行動邏輯。至於跳到愛國主義另一極端的世界主義，其政治理想主義的特質格外明顯，但相對於民族國家的顯性世界體系而言，未免顯得「迂遠而闊於事情」。如何在個體的群體歸屬與群體裏的個人自由雙端之間「執兩用中」，形成「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愛國理念呢？新近流行歐美的憲政愛國主義，也許提供了一個新的選項。

憲政愛國主義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又譯「憲法愛國主義」)，旨在提出將政治忠誠納入到一套自由民主憲政的規範、價值以及程序當中。區別於自由民族主義、傳統的共和愛國主義以及世界主義的理論，憲政愛國主義在民主的普世原則與憲政的特殊規範之間，嘗試為民主國家公民的政治忠誠提供一種新的途徑：即認同政治身份歸屬所存在的種種邊界，也承認政治道德合法的多層次性，同時還面向更為開放的包容、公正和自由。這種觀念旨在解決多元社會中不可能就憲法具體內容達成一致同意的情況下，如何處置作為國家認同核心的憲法認同問題。它主要由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和羅爾斯 (John Rawls) 提供了較為系統的論證，並得到了歐美諸多法政理論家的積極響應、討論和認可。

憲政愛國主義將基於感情的文化認同與基於理性的政治認同兼容起來，嘗試為更加具有寬容特徵的大規模政治體提供政治哲學論證。這樣的愛國主義，馴化了排斥性的政治衝動，讓不同公民間的理解更加從容，讓憲法之下的政治意志的表現與趨同更加可能，讓政治暴力遠離政治生活更加輕易。愛國不再是獨佔性的情感表達與政治排斥的戰場。有些評論認為，憲政愛國主義不僅為民族國家的認同開闢了新空間，更為歐洲聯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的運作提供了理論支持。

從切近的現實來講，憲政愛國主義為馴化釣魚島事件中呈現的中日兩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提供了理論出路。對於因釣魚島領土歸屬引發的衝突事件來講，中日兩國民眾與其糾纏於領土的直接歸屬問題，不如探究國家間更為遠大的合作機制來得重要。而對於中國公眾而言，與其將自己對國家領土主權受到侵害的憤懣發洩為濫施暴力的街頭政治，不如理性爭取憲政機制的改善與國際法程序的訴訟。也許人們會指責這樣的建議太過理性、太過不切實際，但只要想想街頭暴力的效果，我們就可以合乎邏輯地推斷，訴諸憲政愛國主義的程序比起毫無效果的情緒發洩，要來得緊要和及時。雖然釣魚島事件的街頭暴力告一段落，但釣魚島主權爭端遠未呈現解決曙光。由此可以發見，馴化政治衝動之後，才能理性解決政治爭端。喊打喊殺可以逞一時快意，憤怒譴責可以發沖天之怒，但不管是解決中國國內政治中的貪污腐敗，還是解決中日兩國的領土糾紛，終究只能在法治的軌道上才能實現各自或共同的訴求。

如此，中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庶幾可望成為推動國家現代轉軌的強大動力。

從切近的現實來講，憲政愛國主義為馴化釣魚島事件中呈現的中日兩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提供了理論出路。對於因釣魚島領土歸屬引發的衝突事件來講，中日兩國民眾與其糾纏於領土的直接歸屬問題，不如探究國家間更為遠大的合作機制來得重要。